

中东研究方法论

从韩国与土耳其关系看温和建构主义的效用 *

钮 松

摘 要: 韩土关系的发展始于二战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韩土关系迄今整体走势良好。如何观察和分析各种因素对韩土关系的实质性影响至关重要,情感塑造还是利益需求孰轻孰重这个老问题,也存在于韩土关系之中,这分别符合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视角,尽管二者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解释韩土关系,但都因过分注重精神或物质因素而进行了一种绝对、激进的建构过程。温和建构主义兼顾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事实,以及两者关系并不对等的现实,将工具主义对于宗教、文化等因素视作国家间关系中具有伪关联性的因素提升到一种中介变量的地位,修正了原生主义的过分偏重和工具主义的相对忽略。韩土间数十年关系走向,对于理解两国关系提供了大量史实,而如何准确理解两国关系则需要通过温和、理性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才能实现。

关 键 词: 韩国与土耳其; 原生主义; 情感塑造; 工具主义; 温和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 钮松,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1) 04-0066-15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三期和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韩国与土耳其的交往始于二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和韩国在战后都被纳入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中。随着韩国于 1948 年 8 月成立,同属西方阵营的土耳其于 1949 年 8 月 11 日正式承认韩国。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土耳其派军参加联合国军援助韩国,韩土双方自此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感情的国家关系。近年来,韩土双方在军事技术、核电站建设以及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合作。从韩土关系纷繁复杂的表现之中,如何观察和分析各种因素对韩土关系的实质性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情感塑造还是利益需求孰轻孰重这个层出不穷的老问题也存在于韩土关系之中,这分别符合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视角。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最早用来理解民族问题,而其对于民族国家以及之间关系问题也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原生主义视角下的韩土双边情感塑造

原生主义 (Primordialism) 强调宗教 (信仰) 传统和宇宙观,将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看作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土关系从建交迄今一直保持平稳态势,两国关系良好。从原生主义的视角来看,对韩土关系具有首要且决定性作用的是韩土之间长期不断的情感塑造,这种情感塑造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韩土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兄弟之谊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二战期间，基于对战后世界的安排考虑，英苏于1944年10月的第四次莫斯科会议期间达成了“百分比协定”，英国获得了在希腊占90%势力范围的保证，苏联则获得了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主动权。但随着战后英国的衰落，英国将维护西方世界势力范围的职责转移给美国。美国意识到希腊政府与共产主义游击队的作战占据下风，也意识到土耳其与苏联之间因为海峡问题的摩擦有可能引发土耳其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此情形之下，美国于1947年3月12日发布的国情咨文，要求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便是杜鲁门主义，也是冷战正式的开端。由于两大阵营对于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中没有涉及土耳其，但杜鲁门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援助被苏联视为西方阵营在扩大势力范围，而苏联对土耳其的海峡争端也被西方视为苏联试图拓展其势力范围之举，土耳其从此被拉入冷战西方阵营之中。由于东西方对峙逐渐在东西德之间固定下来，苏联也实际承认了土耳其的地位。《雅尔塔协定》划分了美苏在远东的势力范围，1949年中国大陆的易帜首次打破刚刚建立不久的“雅尔塔体系”^①，这让美国对苏联产生了不信任感。朝鲜在苏联的默许下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西方世界决不允许苏联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与在国共内战中采取的中立和“尘埃落定”^②政策不同，这一次采取了坚决的反击，在韩国大部分领土失陷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扭转了战局，土耳其因自身的国内经验以及身处西方阵营的现实地位而派兵参加了联合国军对抗朝鲜。土耳其派出了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15000名士兵，其中741人阵亡，2068人受伤，407人失踪或被俘。^[1]正是土耳其为韩国国家的生存所付出的有力支持与牺牲，韩土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顿时成为“亲兄弟”（blood brothers）。

韩土双方对于这段历史情感的塑造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赋予共同的反共意义，即韩土共同作战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1950年5月的土耳其大选结束了共和人民党的一党专政并首次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替，但赢得大选的民主党和失去政权的共和人民党都在用不民主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利益。韩国正值李承晚的统治之下，他的统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独裁统治。韩国李承晚政权和土耳其民主党政权都在1960年先后被军人推翻。土耳其民主党赢得政权后选择出兵韩国，韩土双边此时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扩张”活动。实际上，实施“脱亚入欧”政策的土耳其第一次通过冷战而进入西方阵营，“对身处二战余殃之中的土耳其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是导致土耳其决策者决心加入北约的因素之一”，“随后关于中东地区将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臣服于共产主义颠覆的担忧——这将造成对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地区威胁——促使土耳其拥抱中东的反共产主义联盟，主要是巴格达协定。”^{[2]159-160}土耳其虽然对于朝鲜共产主义政权没有直接接触，但因与苏联的直接交锋而对韩国的感觉感同身受。韩国的李承晚因强硬的反共立场而坚决不与北方的共产主义者共商半岛统一问题，他甚至不顾美国反对而主张向朝鲜发动“胜共统一”的军事行动，韩国招致朝鲜的沉重打击更是加深了韩国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敌视心理。韩国与土耳其这两个宗教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且较少有历史联系的国家因为共同的反共信仰而共同

① “雅尔塔体系”是1945~1991年国际政治格局的称谓，起源于1945年初英美苏三国在苏联雅尔塔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即建立美苏两极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最终瓦解，新的国际格局迄今仍在形成之中。

② 该政策是美国在中国国共内战（1946~1950年）后期采取的观望政策，目的在于防止中共及其政权成为苏联附庸并对其走向进行观望的同时，逐步撤消对国民党政权的各种援助和支持，并对于台湾的未来地位不置可否，这被美国形象地称为等待“尘埃落定”。美国的观望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以及解放军攻台计划的展开。随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共政权出兵对抗“联合国军”，该政策被美国政府抛弃，协防台湾、支持国民党政权成为美国的再度选择。

战斗并结成兄弟之谊，在七十年代之前，这是韩土双方最大的共同之处和唯一的情感纽带；第二阶段：赋予共同的维护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意义，即韩土共同作战是为了保证民主、自由与和平的西方价值观的实现。冷战期间，随着南斯拉夫最早与苏联的决裂，以及五十年代末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不再是铁板一块；而西方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反美主义，六十年代的世界进入了新的整合期。随着西欧一体化的加快，欧共体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的新兴力量，土耳其于 1963 年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欧盟对申请加入的国家设置了“哥本哈根标准”，其中包括政治标准，即政治民主化和保障人权。在此情形下，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及人权保障水平大幅提升，以期符合欧盟标准，土耳其也于 1999 年获得了欧盟入盟候选国的地位。韩国在朴正熙统治的六七十年代走上了经济腾飞的道路，与此同时，韩国也逐渐改善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韩国“非常期望从它发展起来的冷战外交政策模式中解脱出来”，开始“渴望与共产主义政权，尤其是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不结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3]29}。韩国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向政治民主化成功转型。冷战结束之后，苏联阵营的瓦解、韩土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韩国经济的繁荣都为韩土关系新的情感塑造提供了契机。朝鲜战争爆发 60 周年之际，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为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数千名士兵，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永生在人们心中。”^[4]不仅如此，土耳其也因为韩国的巨大成就而更加确信其出兵的正义性，土耳其“退伍军人们对他们为之战斗的韩国已在上世纪下半叶经历如此大规模经济发展而感到非常自豪。”^[5]

对于韩土在朝鲜战争中的共同作战，无论是早期的反共意义还是如今的维护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意义，都是一种带有特定政治信仰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层面上，韩土之间的情感塑造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单纯国家间的，而是带有政治宗教化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意识形态涉及世界观的坚持和美好社会的设想。

第二，韩土之间从突厥与朝鲜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以及相似的语言来源所奠定的民族主义情绪。朝鲜族与突厥族的近代接触与日俄两国有着极大的关联。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封禁关外满族发源地，禁止关内和属国臣民移居，以图保存龙脉，但此时朝鲜王国民众已有移居中国关外的行为，他们是“季节性的、非常规的和非法的移民”。随着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大片中国关外之地成为沙俄的远东属地，俄国与朝鲜王国拥有了共同边界。1866 年，在俄国远东地区朝鲜族为 100 户，1869 年 8400 人，1927 年 17 万人，20 世纪二十年代约 25 万人，“朝鲜人那时移居俄国与移居满洲的动机一样，在于摆脱饥饿和日本在朝鲜的统治。”^{[6]120}1914 年，俄境内 1/3 的朝鲜人获得了俄国居民身份，苏联成立以后，其境内的朝鲜人全部获得了公民权。随着斯大林农村集体化的加剧及“肃反”的扩大，苏联开始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并于 1936 年开始了大规模强制迁徙朝鲜人到中亚加盟共和国定居的政策。1936 年，至少 118,000 名朝鲜人被安置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1939 年，安置在中亚的朝鲜人达到 182,300 人，迁徙朝鲜人到中亚的外部原因在于，“苏联感受到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满洲进攻性政策的威胁”，“苏维埃政府不信任远东的朝鲜人”。^{[6]121}中亚地区的主体是突厥民族，朝鲜人自三十年代开始与突厥民族共同生活迄今已达 70 余年，关系并无波折，这主要因为：首先，朝鲜人占中亚国家人口数比例极低，无法对主体民族形成挑战，苏联 1989 年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乌兹别克朝鲜人为 191,589 人，不到乌兹别克总人口的 1%；哈萨克朝鲜人为 103,216 人，占哈萨克总人数的 0.6%；塔吉克内战导致 15,000 名朝鲜人迁移至乌兹别克等周边国家，塔吉克朝鲜人的数量不及原先的一半^{[7]273}；其次，朝鲜人是定居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为主的中亚的农业发展有重大作用。最后，朝鲜人自进入俄国便开始了自我本土化，首先沙俄时代是大量皈依东正教，苏联时代又实现了苏维埃化，八十年代以来又

迈向了俄罗斯化，从心理到语言上都已经本土化了。与朝鲜人迁居中亚相反的是，一些俄国突厥人迁居朝鲜半岛，苏俄的十月革命导致宗教信徒充满恐惧，约 200 多名大部分来自喀山的俄国突厥穆斯林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获得了在日治朝鲜的永久居留权，并在汉城、釜山和大邱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和宗教组织^{[8]109}，这些突厥人与朝鲜人和睦相处直至二战结束后迁居土耳其和美国。

尽管中亚突厥人与朝鲜人的友谊历史并不是土耳其共和国与大韩民国的直接友谊，但这种民族间的友谊是超国家的。在 19 世纪末期泛突厥主义兴起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突厥人。中亚塞尔柱突厥人的一支 11 世纪迁入小亚细亚之后不断与当地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通婚，并建立了塞尔柱王朝，中亚的乌古斯人（土库曼人）奥斯曼部落 13 世纪为躲避蒙古人而进入塞尔柱王朝的疆域并在日后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由于经过了长期混血，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中亚突厥民族相比突厥血统比例并不高。但这并不妨碍土耳其人的突厥认同，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中亚突厥国家独立以后，这种认同达到了巅峰。实际上，“现代土耳其对突厥一词的使用是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该国民众将所有穆斯林视为突厥人，而不考虑他们的种族或语言”^{[9]1}。韩国显然考虑到了土耳其的关注与突厥认同。为了塑造土耳其人与韩国人之间直接的民族情感，韩土双方从韩语的来源找到了突破口。尽管韩语的来源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也有学者从韩语语法等多方面认为其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而土耳其语以及同属突厥民族所使用的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属于该语系。现任土耳其驻韩国大使德尼兹·奥兹曼（Deniz Ozmen）分析他在韩国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历史的交往以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根源。”^[5]共同的语言根源也可能引申到民族根源，“韩语通常被认为属于阿尔泰—乌拉尔语系，这发源于中亚的乌拉尔和阿尔泰山脉（韩国人因此在种族上与在各地广泛分布的中亚游牧民族有关联）。”^{[10]2}从中亚突厥民族与朝鲜民族的融洽相处的历史，土耳其语与韩国语被认为属于同样的语言根源以及由此衍申而来的属于同样的民族发源地中亚，这些都可以为韩土两国在民族主义上找到更多的亲缘关系。

第三，韩土双方通过灾难援助、体育赛事等低级政治领域的事例对国家间感情的塑造。1999 年 8 月 17 日，土耳其发生大地震，有报道称地震为 7.4 至 7.5 级，震中在伊兹米特，该地震导致超过 1 万人死亡，逾 3.5 万人失踪，摧毁 42,000 余幢房屋^{[11]86}；另一份报告指出震级为 7.4，有超过 1.5 万人死亡，2.7 万人受伤。^{[12]1}韩国出于朝鲜战争中对于土耳其的感激之情，是最早派出救援队的国家之一。韩国中央 119 救助队、韩国国际灾难救援队及韩国消防防灾厅首席指挥朴正雄（Chungwung Park）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撰文指出，当听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消息时，“韩国人感到无可名状的悲痛”，“这种悲痛对于韩国人而言是为自然，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1.5 万名年轻且勇敢的土耳其士兵作为联合国军的成员参加了维护韩国和平的 1950 年的朝鲜战争”，“所有韩国人期望援助能尽快到达而无任何拖延”，“韩国人从来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们对土耳其的深爱，它在我们 50 年前的苦难时刻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13]。韩国赴土耳其救援队由 17 个队组成，包括救援、医疗和建筑等领域的志愿者，作为副队长的朴正雄甚至在余震中左腿被砸伤，他还遇见了朝鲜战争的土耳其老兵并拜访了其办公室，他通过收到的热烈拥抱体验到“我们是兄弟，我们一起流血”，他的结论是：“我们的救援工作绝不可与土耳其在朝鲜战争中所付出的崇高牺牲来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的参与确实帮助提升我们国家间的关系。”^[13]2002 年韩日世界杯更进一步推进了韩土之间的国家好感。在世界杯决赛韩土季军争夺战上，最后土耳其获胜，韩国球迷“红魔”挥舞着韩土两国国旗，并为两队的精彩时刻喝彩，土耳其媒体指出：“我们的韩国朋友上了公平比赛的完美一课，这种友谊的图景让人难以置信”，“两队球员手挽手、肩并肩地向观众致敬”，“如此友谊让我们的足球运动员们潸然落泪”^[14]。韩国政府还利用承办世界杯的机会直接拉近韩土关系，长期以来，

韩国为土耳其参战老兵提供津贴，在安卡拉和汉城建立纪念碑或者授予勋章，尤为难得的是，韩国为所有参战土耳其军人提供一次韩国政府出资的重返韩国的机会，在 2002 年的世界杯期间，参加过那场“被遗忘的战争”的土耳其老兵在韩国实现了“大团圆”^{[15]111-112}。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将韩土球员和球迷在世界杯中的友谊视作朝鲜战争中结成情谊的延续，“我们再次见证彼此的亲密关系——当我们拥有 2002 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而且在 2006 年的德国世界杯，一组土耳其人前往德国去支持韩国队。”^[5]201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60 周年之际，韩土两国的国家军人足球队在土耳其举行了足球友谊赛，一名韩国外交官就此指出：“这场战争是一个灾难，但在那个时候，它为我们与土耳其间今天的紧密关系开辟了道路。”^[16]2010 年 9 月 18 日，韩土军人足球队纪念朝鲜战争的第二场友谊赛在韩国举行。从这个层面上看，韩土通过低级政治领域的直接交往而塑造了国家间的亲密关系。

总而言之，韩土通过直接历史、间接历史或存在疑问的历史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以及国家间关系的三种情感塑造，这种塑造获得了从韩土两国政府到两国普通民众的相互认同。从原生主义视角来看，韩土关系的良好发展的关键和最根本的原因便是两国之间的类似的政治文化以及该种政治文化的载体——土耳其民族（或突厥民族）和韩民族；土耳其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二、工具主义视角下的韩土相互利益需求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承认宗教情感、信仰基石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情感塑造能够促进和谐，而它们的差异性并不是导致冲突的必然因素。从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情感塑造是指表层因素，影响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是涉及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需求。因此，在工具主义者看来，韩土情感塑造再完美，也只是促进两国关系的辅助因素，最为关键的是韩土双方相互的利益需求，这主要涉及安全合作和经贸往来两大领域。

首先，韩土关系之中的安全利益考量。韩土在安全利益方面的合作主要通过武器装备领域合作体现出来，不容否认的是，韩土双方都有着不同的动机，就韩国而言，高新军事科技的输出有助于拓展其全球武器市场，尤其是因韩土相似的地貌特征而便于检验其武器的实际运用效果，以对国防建设获得经费和技术反馈上的支持；就土耳其而言，多元化的武器战略有助于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北约的重要国家，土耳其不希望在武器上受制于欧美国家，而韩土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就是中东库尔德问题。

韩国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拥有石油产业，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一直盘踞伊拉克库尔德区，这对韩国的石油产业顺利开展形成威胁；与此同时，库工党还不断越境袭击土耳其军事和民事目标，其谋求跨国建立库尔德国家的意愿也与土耳其政府、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产生了巨大矛盾。韩国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2007 年 11 月，韩国石油公社赢得伊拉克库尔德区巴济安（Bazian）油田的开采权，勘探作业于 2008 年 1 月开始；2008 年 2 月，韩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签署石油合作协议，韩国通过参与当地的经济重建以获得石油进口；2008 年 6 月，韩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达成协议，韩国石油公社出资 21 亿美元改善自治区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截至 2010 年 5 月，韩国石油公社目前总共参与到伊拉克库尔德区扎格罗斯（Zagros）盆地的 5 个石油区块，其中 3 个由其主导：1. 巴济安区块，面积 473 平方公里，该公司享有 50.4% 的利益，2009 年 10 月开始勘探；2. 库什·塔帕（Qush Tappa）区块，面积 1003 平方公里，该公司享有 80% 的利益；3. 南桑奥（Sangaw）区块，面积 354 平方公里，该公司享有 60% 的利益。除此之外，韩国石油公社还享有北桑奥区块 20% 和霍勒（Hawler）地区区块 15% 的利益。^[17]由于伊

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政府之间在油气开采权和利益分配上存在矛盾，将库尔德自治政府与各国签订的协议视作非法，因此，韩国在该区域的油气资源开采及石油进口主要由库尔德自治政府来确保，但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伊拉克库尔德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自 1991 年伊拉克半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建立以来，周围国家都在设法与之合作”，“伊拉克库尔德人看到周围国家对他们的独立不那么敌视会有一种安全感，因而也不会去支持邻国同胞中那些坚持强硬路线的民族主义者”^[18]，伊拉克库区政府和韩国都将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不安全的因素。不仅如此，韩国对于库工党还有另一层忧虑，有资料显示，“20 世纪九十年代分离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最有可能是被他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叙利亚，也包括朝鲜的联系所鼓舞。”^[19]⁶⁴ 巴勒斯坦、叙利亚都因朝鲜因素而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朝韩关系的现状更是容易导致韩国对于库工党强烈的不安感。土耳其库工党对于韩国在伊拉克库区石油产业的威胁是间接性的，但对于土耳其的威胁是直接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在《色佛尔条约》中获得了民族自决的权力，但在随后的《洛桑条约》中很快失去，即便如此，库尔德人还是热情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抗击希腊入侵的自卫战争。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不承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而称其为“山地土耳其人”。库尔德工人党 1978 年正式成立并很快诉诸暴力活动，1984 年开始转变为准军事组织，导弹袭击和人体炸弹成为主要的对抗土耳其政府的方式，随着奥贾兰 1999 年的被捕，该党暂时停火，但于 2004 年重新恢复袭击。土耳其与库工党的冲突近年未见缓和迹象，2010 年 6 月，库工党在土伊边境杀死 12 名土军士兵；而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自 2010 年 3 月以来，已有 43 名土军士兵和 130 名库工党武装人员在冲突中丧生，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宣称要打击库工党直至其“全军覆没”^[20]。土耳其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对盘踞在土伊边境地区的库工党武装进行“越境打击”，由于伊拉克库区政府与外来的土耳其库工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合，以及伊拉克库区与土耳其政府的良好关系，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在美军不断撤军的时刻更需要土耳其的支持，“通过提升它与土耳其的关系，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保持和扩大自治，甚至在未来的后重建时期促进其独立事业方面，也赢得了一个更好的地缘政治处境。”^[21]²² 因此，伊拉克库区政府在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工党问题上实际存在着较大默契，双方甚至有着油气合作项目。

韩土双方军事合作最为直接的理由和考量就是库尔德工人党间接或直接的安全威胁，虽然双方并不直接如此表述：1. K-9 自行榴弹炮合同。2001 年，韩国三星科技（Samsung Techwin）与土耳其陆军司令部（TLFC）签订价值 10 亿美元的 155 毫米口径 K-9 自行榴弹炮合同，是韩国迄今最大的武器出口合同。K-9 自行榴弹炮于 2002 年开始在土耳其生产，土耳其陆军司令部总的要求达到 300 个系统，土耳其于 2004 年获得首批“佛提纳”（Firtina）155 毫米/52 倍口径自行火炮（SPGs）。^[22] 2010 年 8 月 30 日，该 K-9 自行榴弹炮正式亮相土耳其胜利日阅兵式；2. KT-1 教练机合同。2007 年 8 月 3 日，韩国国有公司“韩国航空宇宙产业”（KAI）与土耳其签订价值 5 亿美元的合同，这是韩国最大的飞机出口合同和第二大武器出口合同，旨在向土耳其出口 55 架升级版的 KT-1 “雄飞”初级教练机。韩国将出口版本 KT-1 教练机命名为 XKT1-C，它拥有先进的航空导航系统，最高时速为 574 公里，可在 9000 至 11000 米的高度飞行，连续飞行 1700 公里无需加油，该教练机将于 2013 年移交给土方。正如负责 KT-1 出口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员朴在殿所言：“与土耳其的 KT-1 交易的意义在于，已使用美制教练机的土耳其，选择了韩国的教练机。这证明 KT-1 已被承认是拥有良好性能和承受能力的世界顶级教练机。”^[23] 3. XK-2 坦克合同。2008 年 7 月底，韩国与土耳其签订了价值 4 亿美元的联合制造以韩国的 XK-2 坦克为基础的土耳其国产阿勒泰（Altay）主战坦克合同，XK-2 坦克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土耳其奥托卡（Otokar）公司联合韩国现代铁路车辆集团（Hyundai Rotem）等部门联合研制，其目标是在 6 年半之内设计、测试和制造土耳其国产主战坦

克,该合同包括 3.3 亿美元的技术转让费和 4 个坦克样品的制造费 7000 万美元。2015 年此项合同完成之后,韩土还将签订在土耳其生产 200 到 250 辆该型坦克的合同。^[24]土耳其正是依靠强力打击和谈判两种手段来促使库尔德工人党放下武器并离开伊拉克,如 2010 年 10 月,土耳其欲与库工党进行和谈以结束双方 36 年的武装冲突,但 10 月 12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即将于 10 月 17 日到期的对土耳其政府“越境打击”库工党的授权延长一年。土耳其军队 2007 年以来对库工党实施的多次“越境打击”对于库工党武装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耳其武器水平的提高,而以上合同涵盖榴弹炮、飞机和坦克,将有助于进一步大幅提升土耳其的军事能力。库工党是土耳其政府最大的敌人,因此土耳其不惜动用最先进的武器对库工党进行打击,尤其是在西方武器进口受限的情形之下,如“与德国谈判购买豹 2A4 型坦克和 PZH2000 型 155 毫米自行火炮时,德国国内就有人以土军可能将这些武器用于对付境内谋求独立的库尔德武装为由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反对对土出口”,“尽管土耳其和德国最终就进口豹 2A4 型坦克达成了协议,但土耳其不得不考虑德国曾经提出的附加政治条件”^[25],而韩土武器贸易和技术合作不存在此类问题,不排除土耳其今后会加大使用韩国先进武器来打击库工党武装。

其次,韩土关系中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的共同利益。韩国自 20 世纪六十年代朴正熙总统主政以来,开始实现经济的腾飞,其主要发展出口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领域涉及电子产品开发、汽车制造。韩国在九十年代逐渐摆脱政府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虽然遭遇 1997 至 1998 年的金融危机,但韩国在金大中总统时期仍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现已成为世界第 13 大的经济体,面对 2008 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来袭,韩国经济在 2010 年头 3 个月的增长率为 1.8%,第一季度出口量增加 3.4%为整体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韩国目前是亚洲第 3 大经济体。^[26]正因为韩国出口的增加,专家预测 2010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 6.1%,而 7 月份进行的预测是 5.7%;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发展速度仅次于土耳其的国家,较快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27]土耳其长期以来实施了稳健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六十年代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以来,其经济发展一直以欧共体和欧盟标准为指标。随着九十年代欧盟东扩加快,土耳其更是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以期符合哥本哈根经济标准。除土耳其遭遇地震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外,其发展速度呈高增长的状态。土耳其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土耳其逐渐转变成一种出口导向型外向经济模式,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近年的出口受到抑制。土耳其的外向型经济主要通过伊斯坦布尔来运作,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经济的心脏,贡献了土耳其 GDP 的 22%和国家总税收的 45%,伊斯坦布尔吸收了过去 5 年外国对土直接投资额的 76%。^[28]韩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活力,以及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韩土深入的经济合作自七十年代便已开始,双方于 1977 年签订了涉及商业与经济技术的协定,1986 年签订了涉及避免双重征税及确保投资的协定。20 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对土出口的 80%是机器、输送机械、电子产品和纺织品,从土进口的 70%是钢铁产品。^[29]进入 21 世纪,韩土双边经济合作领域有所变化。2010 年 6 月 15 日,李明博总统与居尔总统在汉城会晤,双方“商定要为增进两国间的贸易投资、韩土自由贸易协定(FTA)、能源建设放射等领域的合作”,此次访问“成为了扩大两国在新朝阳产业领域合作的重要契机”^[30]。韩土双方推进自贸区建设将成为未来两国经贸合作的框架,而核电站建设便成为“新朝阳产业”的标志。

韩国与土耳其于 2008 年 6 月进行了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联合研究,在经过随后 2 次共同研究小组会议及听证会之后,双方在 2010 年 3 月 19 日在安卡拉举行的韩土贸易部长会议上宣布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土耳其国务部长扎菲尔·恰拉扬(Zafer Çağlayan)在与韩国外交通商部交涉本部长金宗坝交谈后指出:“双方皆拥有充分的决心在 2010 年 11 月缔结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

定”，“我们交换了旨在增加双边贸易额的意见，并且两国都将施加政治努力以提升这一数字”^[31]。韩土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 2010 年 4 月 26~30 日在安卡拉举行，第二轮谈判于同年 7 月 19~23 日在汉城举行，第三轮谈判于同年 10 月 18~22 日在安卡拉举行。土耳其早在 1996 年便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而韩国于 2010 年 10 月 6 日与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个协定给予韩国在他们拥有与在欧盟市场内之同等条件下间接进入土耳其市场（除农产品外）的机会”，“假如（从欧盟运送货物到土耳其的运费和佣金成本）<（直接出口到土耳其的关税成本）→通过欧盟来进行出口到土耳其”^[32]。虽然韩国与欧盟自贸区协定中有附加的“土耳其条款”，但韩土欧之间的三边关系会导致土耳其难以通过欧盟国家将商品出口到韩国。在韩国—欧盟自贸区协定 2011 年 7 月正式生效之前，这将对土耳其纺织业、钢铁业、机动车及电子产业不利，因此土耳其有意愿与韩国尽快达成自贸区协定以抵消韩欧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冲击。韩国也有相同的意愿，因为它将土耳其视为进入中东市场的“桥头堡”。

电力对于工业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目前世界最高效、最便捷的就是核电，韩国在核电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之后，其核电站装机容量居世界第六位，不仅如此，韩国在 2010 年 1 月与阿联酋签署了整套核电工程出口协议，这极大鼓舞了土耳其，土耳其面临着电力短缺、油价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制约。2010 年 3 月 10 日，土耳其发电控股公司与韩国电力公社（KEPCO）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在土耳其黑海岸锡诺普（Sinop）省建设核电站的协议，如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塔内尔·耶尔德兹（Taner Yıldız）所言，该协议“将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并且他们将努力在三至四个月内完善该协议。如果我们能在某些点上达成协议，并为发出的电确定一个目标价，那么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发展。”^[33]土耳其将核电站建设视为增加韩土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的重要途径。2010 年 6 月 15 日，韩土总统签署核电站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土耳其计划在锡诺普建立 4 座核电站，韩国知识经济部一名官员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拿下四座全部订单。这次签署谅解备忘录，等于是在争取土耳其核电站订单的路上走了五分之四”；土耳其总统居尔指出“锡诺普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是加强两国间经济合作的重要举措”^[34]。韩土双方在签署协议之后便组成工作小组对核电站可行性及建设细节进行了考察，2010 年 10 月初，韩土双方就核电站的具体选址、规模、商业类型以及双方如何协作执行等细节举行会议进行了磋商。由于核电站的特殊性，韩国还积极向土耳其民众进行宣传以消除其忧虑，韩国原子力文化财团（KNEF）主席李在焕指出：“有必要通过鼓励社会进行理性判断并提升公众对核能的接受水平来参与消除这种紧张的努力”，他还引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指出韩国核电站的安全比例为 93.3%，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数 79.4%，且韩国修建一座核电站的时间仅为 52 个月，法国和美国分别需要 59 和 60 个月，因此“我们是最快且最安全的。”^[35]

总而言之，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韩土政府通过情感塑造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某种政治文化氛围，但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质仍然是物质化的因素，即对于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共同需求，而这两者又时常交叉在一起。韩土之间从具体领域出于对库尔德工人党潜在或实际的安全忧虑，或从宏观国防建设领域的考量，而进行的高新科技武器交易是确保相互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不仅如此，高新科技武器同样也有作为商品的属性，韩土双方在此过程之中因韩国获得利润，土耳其获得技术转让而实现双赢。韩土经济模式类似，且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互经济交流频繁，土耳其是沟通中东与欧洲市场的桥梁，韩土为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消除第三方市场的冲击而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韩土之间具体的经贸合作项目就是核电站建设，这对于土耳其而言既有着经济利益，也隐含着巨大的安全利益。工具主义视角看来，情感塑造只是一种表象，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追求才是国家关系实质的决定性因素。

三、温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韩土关系分析

尽管从原生主义的视角或是工具主义的视角来解读韩土关系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两种视角本身在很大层面上存在着对事实本身的避重就轻。韩土关系的长期良好发展使得两种理论视角的解读都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韩土双方所回避的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导致冲突乃至关系恶化的因子。

原生主义在对韩土关系的解释力仅仅限于作为自变量的情感塑造（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而非领域更大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都具有较强的世俗特质，其实际上的情感塑造往往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如对于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的意义便有着多重的塑造，从反对共产主义转变为维护民主、人权，这种转变本身就说明了意义与动机之间的差异性。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时，无论是韩国还是土耳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当时的朝鲜并未对土耳其产生任何的安全威胁，土耳其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困难而需要大量美援，以及西方阵营因苏联的扩张而将共产主义安全化的结果而需要安全保护，而加入北约则是一个重要的选项，而绝非单纯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土耳其于 1950 年 8 月 1 日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但这首先招致了欧洲的反，对，“北约的西欧成员国打算将土耳其排除在北约之外，因而要求土耳其帮助保护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而不让土耳其反过来从中受惠”^{[36]48}，出兵朝鲜为土耳其赢得了西方的认同并于 1952 年顺利加入北约。无论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还是加入北约的目的，土耳其出兵朝鲜与韩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耳其加入北约成功将其在欧洲心理中的地位从“中东地区同盟的基石”^①转向了欧洲，这与其凯末尔革命以来的欧化政策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从欧盟的视角来看，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看起来已是支持土耳其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竞标的积极因素。”^{[37]201} 尽管从民族主义的塑造上可以找出土耳其民族（突厥民族）与朝鲜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与现实的事实，但不可忽视的是，朝鲜与韩国皆为朝鲜民族（韩民族）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出于反共还是维护民族、人权，土耳其参战实际上是介入了朝鲜民族内部的冲突，土耳其与朝鲜的交战也是土耳其民族与朝鲜民族关系的另一面。土耳其与韩国的国家关系因朝鲜战争之故而建立但长期停滞，其近年来通过地震救援、足球外交等领域的情感塑造也被视为朝鲜战争中战斗情谊的凝聚以及韩国的感恩之情，但 2001 年土耳其与其曾经兵戎相见的朝鲜正式建交。原生主义下的韩土情感塑造尚存反例，那么更深层次的宗教认同领域则是韩土双方都在回避的地方。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带来的宗教方面的事实是，土耳其军中的宗教人士在韩国建立首座清真寺并向韩国民众宣教，这是伊斯兰教重新传入韩国的开始，伊斯兰教已成为韩国不可忽视的一支重大力量并参与到韩国的中东外交中去。^[38] 由于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宗教世俗化和欧化战略，以及主导韩国政治的基督教政界和学界，韩土双方都对于伊斯兰教有着明显的回避，庆祝伊斯兰教在韩国传播的活动主要在韩国伊斯兰教界内部举行。以上不难看出，韩土关系的情感塑造本身有着阶段性对于事实的取舍，深层次的宗教认同也完全被忽略，这说明情感、宗教（信仰）本身并不是主导国家关系的自变量，并不具有完全的决定作用，这是原生主义视角的局限性。

工具主义对于韩土关系的解读则显得相对冰冷，权力与利益成为自变量，但也不忽视宗教与情感塑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韩土在安全与经贸领域进行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合作，这对于双边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作为韩土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库尔德问题而言，无论是在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上韩土均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欧

① 参见 Cihat Göktep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urkey, 1959-1965*,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9.

盟的全球治理理念是通过“经贸促民主、人权，民主、人权促和平、安全”的路径来实现其全球治理的目标，对于地区冲突主要通过盟外治理方式解决，但对于塞浦路斯则采取了盟内治理的路径。土耳其作为入盟候选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欧盟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规范，其对于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人权改善皆有着较大的成绩，但由于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尤其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盘踞，使得土耳其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寄希望于通过发展伊拉克库区经济，从而实现土耳其经济与伊拉克库区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对于土耳其库尔德区起到辐射作用，以最终消除库工党的暴力活动，实现地区和平，这实质是对欧盟解决地区冲突两种途径的糅合。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的主要经贸往来方式便是油气方面的合作，鉴于伊拉克库区此前与外国政府签署的油气合作协议并不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伊拉克对于土耳其与库区的合作给予合法身份便显示出伊拉克在库尔德问题上对于土耳其的重视。2009年6月，伊拉克库区开始第一次经由土耳其出口石油，如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所言，伊拉克中央与库区政府之间的“协议是合法、合宪和正当的，并且它们代表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39]。但伊拉克中央与库区之间的矛盾依旧明显，2010年7月，“在与巴格达的中央政府在油气销售方面未达成协议之后，北部伊拉克的当局正计划通过土耳其和纳布科计划出口天然气到欧洲”，伊拉克库区总理萨利赫称库区拥有3万亿至6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40]在此情形下，土耳其与伊拉克权衡利弊，在抑制伊拉克库尔德区走向最终独立上相互妥协。由于从基尔库克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石油管道是“地处内陆的库尔德地区出口石油唯一可行的方式”，2010年9月，土耳其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签署协议，规定未经伊拉克中央政府授权项目的石油不得经由土耳其管道出口。^[41]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石油出口上掌握了较大的主动权。鉴于韩国与伊拉克库区政府的油气合作协议并未得到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认可，未来涉及韩国的油气出口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抉择，这对于韩土关系将会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土耳其到时将不得不在确保伊拉克库区的自治与保持韩土关系良好发展上面临困境。不仅如此，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也有着经济和安全的利益，正如土耳其驻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领事希岑（Aydin Selcen）所言：“我们的总理希望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通过经济来实现相互整合”，“我们希望土耳其与库尔德地区的边境地区通过将其转变成为一个贸易和旅游目的地的方式来变得非常平静。”^[42]总而言之，韩土关系与韩国伊拉克关系以及韩土在伊拉克库区的利益博弈有着巨大关联，土耳其希望韩国通过参与库区开发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和局势稳定，但也与韩国存在着竞争，虽然韩国也有着安全利益的考量，但这远不及土耳其，土试图将自身库尔德问题安全利益与伊拉克库区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解决。不难看出，工具主义对于韩土关系的分析过分强调了权力和利益的因素，这种权力与利益的稀缺性导致了国家之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尤其是经济利益被安全化的情况下。

从以上事实与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韩土关系长久以来保持良好态势是主线；第二，两国关系无论是在情感塑造领域还是在权力、利益领域都存在着合作与冲突的两个方面；第三，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分析都带有缺陷，必须引入一种温和的分析框架。从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不难看出，物质因素（权力、利益）有较强的引导作用，而对于宗教因素具有强烈的排斥，对于伦理、正义等价值因素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对于宗教因素和价值因素的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力图纠正过分的物质主义倾向，物质主义与情感塑造（宗教因素、价值因素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就需要走向一种温和建构主义^①的分析框架，即强调国家关系的主导因素是物质因素，但非物质因素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国家的经济衰败和政治滞后会让非物质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演变为暴力冲突，而这一切都根植于政治

① “温和”建构主义主要针对原生主义、工具主义的“不温和”而言。

领导人的认知结构 (Cognitive Structure)，他们常常在有限的范围内为物质利益添加情感的因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认知”是“知识”的动词形式，因此，认知结构就是知识的结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其实就是一种判断，虽然每个人认知的“结构”相同，但输出“结构”进行处理的“原料”不同，即后天的经验不同，这就会导致最后的结论因人而异。正如伊曼纽尔·阿德勒所指出的，“认知结构产生‘证据’以确定它们的正确性，并将那些被认为相对于集体理解的特立独行的行动视为‘错误’”，“集体理解可以建立在科学知识或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上”，“认知结构如同科学范式一样，对于人们思考‘对’或‘错’——他们在此投入关注——以及他们发展什么样的期望，具有调节作用和制约作用”^{[43]76}。总而言之，韩土双方领导人通过三种方式来解释韩土关系需要忽略那些冲突层面而保持良好的原因。

首先，继续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展，这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主义，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尽管韩国在伊拉克库区拥有较多的油气勘探项目，但其并未获得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承认，且所有油气资源的出口都需要通过土耳其的管道，因此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的油气利益上实际上占据相当大的主动地位。不仅如此，土耳其没有独自承担伊拉克库区油气开发乃至整体经济开发的实力，韩国的参与对于土耳其是有利的。因此，韩土双方在伊拉克库区存在着利益的交汇，分配性冲突并不明显。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作为经济持续增长且西式政治民主化发展迅速的韩土双方民选领导人具有理性判断的考量，就土耳其而言，其领导人在库区利益的判断侧重于库区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与安全的实现，而韩国的利益判断则侧重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与能源保障，两者不存在着结构型的矛盾，因此在纯经济利益角度的冲突由于各自利益关切点的差异而不会被韩土领导人夸大和激化。就民众而言，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冲突并不明显，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关键在于让民主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将民众个人经济条件的改善与特定的内外政策联系在一起。

其次，通过权力政治威慑、压制国内的不良情绪。既然双方领导人在对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上通过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行了理性的判断，那么各自国内与领导人情感塑造的集体理解不相一致的言行或历史事实便成为要受到压制的不良情绪。土耳其掌握政权的精英阶层恪守世俗化传统，即使是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也仍然在世俗民主政权的范围内活动，土耳其领导人并不希望宗教情绪成为韩土关系的纽带或者激化矛盾的导火线。土耳其领导人在宣扬参加朝鲜战争的意义时尽力回避促使伊斯兰教在韩国传播的事实。不仅如此，韩国传教士在伊拉克、阿富汗、也门、利比亚等国纷纷遭遇抗议，而土耳其对韩国传教士在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传教活动保持缄默。主导韩国政治和外交的基督教精英非常善于开展宗教外交活动，但韩国领导人出于对土耳其国家立场的了解而回避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联系，韩土双边官方对于朝鲜战争的纪念活动从无提及在伊斯兰教上的联系。在涉及世俗情感因素上，对于2010年5月31日发生的以色列袭击土耳其国际救援船事件，韩国出于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而保持缄默，土耳其在高调动员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之时并未牵涉韩国。由于韩土双方并无权力和利益上的分配性冲突及标志性的事件，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频繁，韩土民间并不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对方，政治领导人更易于通过引导舆论，筛选、过滤事实来进行辅助性的情感塑造。^①

① 这主要只是体现在韩土关系上，美土关系就完全不同。尽管美土是军事盟友关系，土耳其也是美国在北约最主要的战略伙伴之一，但土耳其国内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迥异，土耳其共产党就有着强烈的反美主义倾向。笔者2009年4月在土耳其多座城市考察期间，土耳其政治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塑造美土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奥巴马总统访问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的当日，土方出动大量警力和装甲车进行戒备，所有通往蓝色清真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由于蓝色清真寺周围的古城墙外就是马尔马拉海，因此反对派的政治集会也成为不可能。土耳其共产党则在其他地方举行集会，反对奥巴马访土，警方严密监视，那些超出和平集会底线的示威，土警方便使用武力强行驱散。因此，韩土关系相较于美土关系平稳得多，土耳其不存在激进的反韩情绪，威慑和压制无需通过武力来实现，舆论引导非常有效，韩国国内亦然。

最后,通过对话作为另一种改善不良情绪的管道。尽管韩土关系整体发展良好,但宗教因素始终是容易引发暴力与冲突的中间变量,这在韩国尤为明显。韩国允许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自由发展,但伊斯兰教在韩国国内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非政治的障碍:第一,伊斯兰教被视作是“外国人的宗教”,“韩国人到殿堂礼拜不是仅做礼拜,而是也成为以礼拜殿为中心的社团的一分子”,“韩国作为单一民族的社会已有数世纪,因此大部分韩国人不习惯加入一个被与他们不同长相、说不同语言的人所主导的社团”;第二,伊斯兰教的某些清规戒律有时与韩国的社会生活和习俗冲突,包括一天五次礼拜,禁食猪肉、禁止饮酒、周五主麻日等;第三,在伊斯兰教的具体实践方面,如韩国人习惯在宗教的礼拜殿里面供奉偶像或者画像,“基督教已经尝试克服传统的韩国人对于一神教的不适应,甚至基督教向一个神中的三个人祷告”^①,“伊斯兰教的真主是一个且只有一个”,“伊斯兰教的真主,与耶稣基督不同,决不可用塑像或画像来描绘”;总而言之,伊斯兰教在韩国拒绝韩国化。^[44]韩国民众对于伊斯兰教多有误解,尤其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妖魔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韩国官方与国内穆斯林之间的误解主要通过穆斯林团体的中介作用来对话解决,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名乌兹别克穆斯林因韩国政府项目来韩国学习养殖技术,但却被派到养猪场,最终该穆斯林向韩国穆斯林中央圣院申诉,正是中央圣院沟通了穆斯林与韩国政府并使得韩国政府更多地认识了伊斯兰教并改变了很多无心的错误,这有助于减少韩国穆斯林乃至世界穆斯林对于韩国的敌视态度。土耳其虽是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但各国穆斯林的境遇也会影响土耳其领导人和民众对该国的情感好恶,这不是领导人能完全压制的。^②长期以来,朝鲜战争在土耳其也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并不被土耳其人视为他们近代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安卡拉火车站的几个街区之外有一座纪念朝鲜战争阵亡者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引人注目,(只是)生活中的现实,而非一大特色景观”,这是因为参加该战争是对土耳其之前近30年不卷入国际冲突政策的突破,而是否要继续保持这种不卷入政策的争论持续到20世纪九十年代。^{[45]92}土耳其在九十年代开始加大对韩经贸和军事合作时,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事实才被其大力当作情感塑造的依据,土耳其也加大与参战士兵的对话,鼓励其参加韩国方面组织的多种纪念活动,而长期以来他们的诉求是难以通达政府的,这也反映了土耳其在与民众对话机制上所取得的进步,如土耳其《今日时代报》通过调研后撰文指出:“人们希望传递他们的信息,并且真正使他们生气的是,他们感到被政府忽视。”^[46]

总之,政治领导人发展经济与推进民主化是为了提升理性主义,减少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倾向;威慑、压制和对话都是具体的手段,前者强调通过筛选事实来一时地弱化冲突,后者则强调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思想,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语

从韩土关系的三种视角分析不难看出,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领导人基于国家当前的内外战略,即权力与利益的需求,而通过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实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情感塑造的过程,亦即进行关系建构的过程。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民众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一旦发生交往和接触的行为,其结果一定会涵盖正面与负面两个层面。

① 实际上就是讲三位一体,唯一的神(上帝)是具有三个位格的神,“一个神中的三个人”只是比较形象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符合神学。

② 如土耳其政府部分官员对我国新疆“7·5”事件的指责有其政治意图,但也有民间浓厚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情感的推波助澜,领导人的政治意图与民众的宗教、民族情感结合,这就造成对“7·5”事件事实本身以及中国穆斯林境遇究竟如何并无理性了解,产生了较多的谬误。

过分凸显国家之间共同的宇宙观（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理念）和文化共性（包括民族主义）的决定性作用的原生主义，以及在承认宗教、政治和文化塑造的部分作用基础上过分强调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需求合作的工具主义，都因过分注重精神因素或物质因素而进行了一种绝对、激进的建构过程，而不是一种温和的建构过程。温和建构主义首先体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的物质主义本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主义更容易迈向一种科学化的分析框架，其解释力更易为人类^①所理解；其次关照到了现代国际关系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宗教转向，这种宗教转向包括深层次的宗教，也包括表层的文化和民族主义等，从一种非物质逻辑起点上对于现行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挑战，但精神世界的人文主义倾向而难以走向能为人类皆能接受的科学化的解释。温和建构主义兼顾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宗教介入国际关系的事实，以及两者关系并不对等的现实，将工具主义对于宗教、文化等因素视作国家间关系中具有伪关联性的因素提升到一种中介变量的地位，修正了原生主义的过分偏重和工具主义的相对忽略。韩国与土耳其数十年关系走向对于理解两国关系提供了大量史实，而如何准确理解两国关系则需要通过温和、理性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 Kim Chee-ho. President Roh Lays A Wreath in Honor of the Turkish Veterans of the Korean War [EB/OL]. [2011-03-01]. http://english.mpva.go.kr/press/issue_view.asp?news_seq=19&page=26&p_part=0&p_item=.
- [2]. Lenore G. Martin. Turkey's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M]. // Lenore G. Martin, Dimitris Keridi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A: MIT Press, 2004.
- [3]. Fred Warner Neal. Around the World in 60 Days: A Political Travel Diary of a Visit to Taiwan and South Korea[R].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978.
- [4]. 土耳其纪念朝鲜战争烈士. [EB/OL]. [2010-06-25]. <http://www.trt.net.tr/trtworld/zh/newsDetail.aspx?HaberKodu=f8c057a2-d50b-4076-a43f-0f975439188f>.
- [5]. Yoon Won-sup. Turkey, Korea Blood Brothers[N]. Korea Times, 2007-06-03.
- [6]. Jeanyoung Lee. Ethnic Korean Mi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M]. // Tsuneo Akaha. International Seminar: Human Flow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in Northeast Asia. Monterey, CA: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 [7]. Birgit N. Schlyter. Korean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Formal Soviet Central Asia [M].// Gabriele Rasuly-Paleczeck, Julia Katschnig. Central Asia on Display: Proceedings of the VII.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Lit Verlag, 2004.
- [8]. Lee Hee-Soo.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Islamic World[R].// Kore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UNESCO. KUCES Lectures on Korean History & Culture.
- [9]. Soner Cagaptay. Islam, Secul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Turkey: Who Is A Turk?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0]. L. Robert Kohls. Learning to Think Korean: A Guide to Living and Working in Korea[M].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2001.
- [11]. Bob Digby, Dan Cowling. It's a World Thing: Geography for Edexcel GCSE Specification B[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2]. Alex K. Tang. Izmit (Kocaeli), Turkey, Earthquake of August 17, 1999 Including Duzce Earthquake of November 12,

① 指不带有宗教、民族和文化属性的抽象的、理性的人类整体。

- 1999: Lifeline Performance[R]. Amer Society for Civil Engineers, 2000.
- [13] Chungwung Park. Kardeş Turkey and Korea in Sacrificing Precious Blood: In Remembrance of the İzmit Earthquake[N]. Today's Zaman, 2010-08-17.
- [14] Turkish Media Says Thanks[N]. BBC, 2002-06-29.
- [15] Ata A. Akiner. Forgotten Consequences: the Impact of Korean War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i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M]. Ata A. Akiner, 2009.
- [16] Ümit Enginsoy. Turkey, S. Korea to Commemorate War's 60 Anniversary[N]. Hürriyet Daily News, 2010-05-07.
- [17] Korea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Iraq. [EB/OL]. [2011-03-01]. http://www.knoc.co.kr/ENG/sub03/sub03_1_5_1.jsp.
- [18] 汪波.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0(3).
- [19] Gerhard Kümmel.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Suicide Attacks in Asymmetric Warfare[M]. // Giuseppe Caforio, Gerhard Kümmel, Bandana Purkayastha. Armed Force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 [20] Kristen Chick. PKK Attacks: Turkey's Leader's Vows to "Annihilate" Kurdish Rebels[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0-06-20.
- [21] Wang Bo.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Iraqi Kurds after the US Military Retreat[J].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2010(2).
- [22] Samsung Techwin. Development of K9 Thunder. [EB/OL]. [2011-03-01]. http://www.samsungtechwin.com/product/features/dep/k9_e_new/01.html.
- [23] Jung Sung-ki. S. Korea Signs Trainer Deal with Turkey[N]. Korea Times. 2007-08-05.
- [24] Turkey Signs Deal with S. Korea for Altay Tank Project[N]. Defense Industry Daily, 2008-08-03.
- [25] 专访: 韩国与土耳其的“坦克友谊”说明了什么? [EB/OL]. [2008-08-05].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8/05/content_8957218.htm.
- [26] South Korea Economy Boosted by Exports [N]. BBC, 2010-04-27.
- [27] Cheon Jong-woo. South Korea Economy to Lose Steam in 2011[N]. Reuters, 2010-10-14.
- [28] Turkey Remains Monitoring Power of Turkey's Economy[N]. Hürriyet Daily News, 2010-08-25.
- [29] Seong Min Hong. Korean Economy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d Its Relation with Turkey [EB/OL]. [2011-03-05]. http://hopia.net/kime/book/k_stud_e1.htm#7.
- [30] 孙柳. 韩—土耳其举行首脑会谈 [EB/OL]. [2010-06-16]. <http://chinese.korea.net/detail.do?guid=47615>.
- [31] Çağlayan: Turkey, S. Korea to Conclude FTA Talks in November[N]. Today's Zaman, 2010-03-20.
- [32] Mahmut Tekçe. FTA between Korea and Turkey: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EB/OL]. [2010-06-29]. <http://www.kiep.go.kr/include/filedown.jsp?fname=tekce%20kiep.pdf&fpath=news06>.
- [33] Korea, Turkey to Cooperate on Sinop Nuclear Power Plant[N]. Today's Zaman, 2010-03-11.
- [34] 朱庸中, 李性勋. 韩国土耳其签署核电合作谅解备忘录[N]. 朝鲜日报, 2010-06-16.
- [35] Fulya Özerkan. Turkey Must Learn of Nuclear Energy's Benefits, Korean Official Says[N]. Hürriyet Daily News, 2010-10-11.
- [36] Mustafa Kibaroglu, Aysegül Kibaroglu. Global Security Watch—Turkey: A Reference Handbook[Z]. New York: Praeger, 2009.
- [37] Harun Arikan. Turkey and the EU: An Awkward Candidate for EU Membership? [M]. Aldershot: Ashgate, 2006.
- [38] 钮松. 伊斯兰教与韩国的中东外交[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0(3).
- [39] Oil Disputes with Baghdad Remain Unresolved, Iraqi Kurdistan Begins First-time Oil Exports[N]. Al Arabiya, 2009-06-01.
- [40] Namık Durukan. Northern Iraq Looks to Export Gas via Turkey and Nabucco[N]. Hurriyet Daily News, 2010-07-05.
- [41] Ali Latif. Iraq and Turkey Embargo Export of Kurdish Oil[N]. Medya News, 2010-09-20.

- [42] Turkey Wants to Integrate Iraqi Kurdish Region through Economy[N]. Iraq Business News, 2010-05-19.
- [43]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5.
- [44] Don Baker. Islam Struggles for A Toehold in Korea [EB/OL]. [2010-06-16]. <http://www.asiaquarterly.com/content/view/full/167/>.
- [45] John M. Vander Lippe. Forgotten Brigade of the Forgotten War: Turkey'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0(1).
- [46] Klaus Jurgens. Feeling the People's Political Pulse Away from Turkey's Capital[N]. Today's Zaman, 2010-07-24.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derate Constructivism: South Korea-Turkey Relations as a Case

NIU Song

Abstract South Korean-Turkey's ongoing good relation began after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after the Korean War. How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impact factors on S. Korean-Turkey rel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mong them, emotional or interests dema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Primordialism and Instrumentalism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two can explain S. Korea-Turkey relation within a certain range, but are in an absolute, radical constructive process due to an excessive focus on mental or physical factors. Moderate Constructivism theory improves some elements, such as religion and culture, which are emphasized excessively by Primordialism and neglected relatively by Instrumentalism, from pseudo-relevance factors to mediators. Confronted with large number of complicated historical facts, only under moderate and ration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 Korean-Turkey relation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S. Korean-Turkey Relation; Primordialism; Instrumentalism; Moderate Constructivism

(责任编辑: 孙德刚)